◆杂　谈

守住儿童权益

近期，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倪春霞在天津大学一场有关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的研讨会上透露，我国今年将首次摸清留守儿童底数。

留守儿童，一个特定的称谓，一个特定的群体，同时，也成为权益保护最薄弱的群体，可能没有之一。摸清留守儿童底数，这个必须有。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准确收集整理是最基础的环节，接下来才能运用云计算等现代化的手段进行分析，进而出台量身定制的政策。诚如有关人士所认为的，“大数据一定要科学，如果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所有的对策分析和对策提出都是不能对症下药的”。

留守儿童摸底贵在政策兜底、政策托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而社会政策要托底，则是要守住民生底线，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先有摸底后的大数据，后有大数据对应的政策托底，这样就会进入良性轨道，更加有效地呵护这一特殊群体。政策托底，就会托起留守儿童明天的希望，托起社会责任，托起共享发展。

法治建设也要站在大数据的风口起飞。摸底留守儿童数量，为托底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依据”，同时，也要成为法治建设的内生动力。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宗旨，不断完善现行的儿童保护法律，或者讲，按下保护儿童权益的法治“快进键”，让留守儿童在同一片阳光下健康成长，让他们既“留”得住乡愁，更“守”得住权益。（2016年3月28日《大河报》李云）

心态的“惯性”

曾经读过这样一个故事：不少大屠杀的幸存者在二战后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养成了奇怪的“习惯”——即使市场上商品并不短缺，也要往冰箱里塞满食物。很多食物储藏久了就会过期甚至变质，但他们宁可把食物扔掉，也绝不能容忍缺少吃的东西。对这些当事人而言，饥饿的记忆是如此刻骨铭心，他们再也不能、也不想挨饿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的生活状态可以迅速地发生改变，但心态的改变是有延迟的。

和祖辈或父辈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几乎从没有经历过饥饿。模糊的童年记忆中，仅有极少部分与食物稀缺有关：母亲曾经偷偷摸摸地用粮票、烟票和市场里的农民换鸡蛋；小学语文课本中充满了对清贫的赞美；到了中学时，课本上的内容还没有来得及改变，各式各样的物资就已经涌入了所有人的生活——我第一次意识到世界上竟然存在所谓的“名牌”，衣服、运动鞋、随身听……中国人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基本摆脱了贫困。人们对财富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从甘于贫穷到勇于致富。

但是贫穷的心态依然是有惯性的。偶尔在新闻里看到，有人在公路上哄抢散落的橘子、大米，有人为了几毛钱的折扣不惜在超市门口排几个小时的队，虽然绝大多数人已经得以免于饥饿和贫困，但有些人依然保有贫穷时代的思维习惯。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相信“为富不仁”。某富豪捐出几百亿做慈善，那么人们就会假定他的目的是避税，而非真心为善。他们无法想象有人在积累了如此多的财富之后，居然会选择主动放弃。占有、占有，只有牢牢地把钱攥在手心，才是真正的财富——这种心理不恰恰是一种“囤积癖”吗？贫穷的心态妨碍了人们进一步追问：人获得财富究竟是为了什么？

汉语中“贫”与“穷”两个字的含义稍有差异：“贫”字从“贝”，本义指缺少财物，与“富”相对，意味着物质上的匮乏和不足。《庄子·让王》中说：“无财谓之贫。”而“穷”字原本为形声字。繁体的穷上边是“穴”，下边是“躬”，表示身在穴下，处境窘困，可以引申为不得志；简化字转变为会意，表示力在穴下，有劲使不出。所以，“穷”更多地指人对自己处境的心理感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今的贫人不多，穷人却不少，脱贫之后还要脱穷。（2016年第1期《书城》郝喆隽）

◆观　点

如何发挥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

对于市场机制尚在建立和完善之中、政府作用仍十分重要的我国来说，发挥好政府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创新就是寻找（发现）或创造（发明）不均衡，并利用这种不均衡占据发展制高点的活动。如利用商品价格在不同地区的不均衡，可形成流通贸易发展模式；苹果公司将手机的智能化和服务商的多样化、集聚化紧密结合，创造了手机市场的不均衡，赢得发展先机。与此同时，创新又是风险很大、通常需要较大投入的社会活动。明摆着的不均衡，易被人们发现，竞争激烈，机会稍纵即逝。如一些引进项目投产之日即成亏损关闭之时。而看不准、可能有前景的不均衡，需要前期投入探索，既有可能获得成功——一本万利，如微信的创造（发明）；也有可能失败——血本无归，如许多新药的开发研究。因此，对于创新这样一个需要大量前期投入、具有较大风险的创造性活动，政府该做的就是鼓励、保护、引导和恰当的亲力亲为。倡导创新理念、营造创新氛围，让创新者有动力和条件去创新，让创新成果顺利发挥作用，为社会谋利，让创新者获利。

一是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创业创新门槛，使创业创新不被繁杂的行政审批手续而烦扰。

二是严格立法和执法，切实保护知识产权。要明确界定创新成果所有权，并切实给予强力保护，坚决打击一切侵权行为。

三是建立良性的激励机制，让创新者得到应有的奖赏。

四是引导和建立风险投资市场，搭建创新融资平台，让创新者的风险投资有良好的融资渠道，让资本市场去识别具有真正商业前景的创新项目，引导社会创新活动。

五是用政府力量打破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如对专车的发展，政府应出台法规，鼓励、保护竞争，打破传统出租车行业的阻挠。

六是除体制机制创新之外，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对看得准、投资大的少数关键基础创新项目，如核电、航天等，政府亦可出资干，甚至自己组织力量动手干。（2016年3月《中国国情国力》郑京平）

打通话语体系实现有效传播

当前的舆论传播中主要有三种话语体系：政治型话语、学术型话语和社会型话语。政治型话语是以主流意识形态语言为主要工具和表达手段，学术型话语是以符合学术规范的语言和理论建构为手段和工具，社会型话语则以符合社会大众思维和表达方式的语言为手段和工具。这三种话语体系事实上相应地对应着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或受众：政治型话语是以处于上层建筑层面的广大官员为主要听众，学术型话语以知识分子为主要信息接收者，而社会型话语则面向普通的市民社会。

当前舆论传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话语体系类型混杂，缺乏清晰的边界，无法做到真正相互贯通和话语融合。此类问题在每年的两会期间表现得非常突出。针对同一问题，不同的话语体系各说各的，角度、出发点各不相同，解决问题的途径也有很大差异甚至在价值观层面出现冲突，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沟通犹如“聋子之间的对话”。

比如关于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政治型话语表述为，“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学术型话语则倾向于认为，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发展在新的阶段出现的一般性特征，即旧有的比较优势逐渐消解而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比如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低成本，即依靠所谓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来推动经济粗放式增长。当出现人口红利式微和资源瓶颈约束后，单靠投资、出口和第二产业的发展来拉动经济已经是步履维艰。对于市民社会而言，所谓的经济新常态，最切身的感受是失业和相对工资的下滑，还有结构性的房地产市场泡沫。

针对经济新常态，如何能够在三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中清晰地显现出共性来，并由此共性出发，提出更为清晰明确的财政货币政策措施，能够统一思想，并得到充分的学理支撑，以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的形式广而告之，对于贯彻中央决定，形成社会共识合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针对同一问题，话语体系异质性程度过高，很可能会造成公众理解的错位，甚至社会情感乃至共识的撕裂。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其广泛的代表性自然说明包括了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也正是代表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很容易形成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同一议题的理解上的多层次性。对于2016年的两会来说，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肯定是其中的重大议题。特别是关涉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更是代表们议论的话题。然而话语体系的“割据”和缺乏沟通，会对重大议题的讨论产生相当的干扰，进而对解决问题的方法乃至态度都会形成负面影响。

比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问题。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不同的话语体系有不同的阐释和陈述。北京某房产商在路边的广告已经打出了“去库存”的口号，将价格醒目地写在广告牌上，以示在中央“去库存”号召下做出的积极响应。如果普通市民看到此类广告，肯定不明就里，不清楚“去库存”和自己住房的改善有何联系，和房价的高低有何联系。这是明显的话语体系的混乱造成的理解上的模糊不清。

话语体系的存在是一种必然，因为不同话语体系的受众不同。但在传播过程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没有随受众的变化而调整和转换话语体系，缺乏话语体系之间的适度融合。另一个问题是，话语体系自身存在模糊不清。比如，在学术研究中，严格的学术范式不够，存在意识形态的话语充斥学术研究期刊；在以政治家和决策者为主要受众的传播过程中，政治型话语清晰度不够，针对性不强；而在面向大众的传播过程中，缺乏将政治型和学术型话语顺利转换为社会型话语的能力。如此，在舆论传播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信号失真和信息损失，造成信息不对称，影响最终的决策和政策执行效果。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根据受众类型对话语体系进行相应的转换，这既需要受众自身素质的不断提升，也是对话语体系使用主体的高标准要求。

总之，打通舆论传播话语体系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重大课题。（2016年第8期《中国新闻周刊》杨英杰）

◆评　论

把握力量转移大趋势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力量转移”已成为人们理解和把握21世纪世界发展趋向的重要坐标。暴力、财富和知识三种力量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同时并存，共同作用，但比重、影响和价值排序不同。总的看来，力量转移的趋向是由“暴力主导”到“资本主导”再到“创新能力主导”，力量的这种转移，既是科学技术广泛应用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

从哲学角度看“力量转移”重心，有一条基本规律：历史越往前追索，人以外的物质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大；历史越往后发展，人的创新能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日趋突出。从历史角度看“力量转移”方式，有一条基本规律：由前现代和现代静态的“线形水平转移”走向当代动态的“漩涡效应”。从经济角度看“力量转移”链条，有一条基本规律：在工业化时代，社会经济链条的重心在中间的“加工制造”，而在后工业化时代，社会经济链条的重心由加工制造业转向两端的“创意研发与营销服务”，从事前端的“创意研发”与后端的“营销服务”的白领阶层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合理把握力量转移趋向，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社会自主创新能力，激发每个人的创新潜能，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性问题，也是实现中国梦的新契机。通过对力量转移之时空背景、内在机理和基本规律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世界格局的走向和中国转型发展的方向。

力量转移理论是分析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种有效的理论框架。只有正确认识和积极顺应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把握发展主动权，推动中国崛起。自主创新能力既是中国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的强大“助推器”，也是中国和平中国崛起和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领航中国发展的领导者和决策者要有哲学上的全球视野、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掌握“力量转移”的主动权。

中央提出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就反映了当今时代力量转移的大趋势，是一种战略性思维。个人应捕捉“力量转移”的新动向，努力掌握个人发展的命运，打造创新的“火花”；社会应反映“力量转移”的新变化，营造创新的社会氛围，凝聚创新的“火苗”；国家应顺应“力量转移”的新潮流，把握“力量转移”的规律及其带来的新机遇，积极主动抢占“力量转移”的制高点，形成创新的“火流”。当今世界正在走向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智力尤其是创新能力日益正成为主导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力量。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应反映这种“力量转移”的时代趋势，引导国家、社会和个人走向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发展之路。（2016年第1期《哲学研究》韩庆祥 张艳涛）

◆视　界

警惕人工智能的五个“烟雾弹”

人工智能的话题，最近因谷歌公司一场商业炒作“围棋人机大战”而再次大热起来。各种不同的看法纷纷表达，其中既有天真糊涂的想法，也有居心难测的说法。为了厘清思路，有必要就下面五点进行认真思考。

“老虎还小”不构成养虎的理由

当人们表达对人工智能将来失控或危害人类的担忧时，经常见到人工智能业界人士，或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盲目乐观的科学主义人士出来说：人工智能目前还很初级很弱小，所以不必忧虑云云。这种说法常见于媒体，其实背后暗含着荒谬的逻辑。

我们担心老虎吃人，所以有“养虎遗患”的成语，怎么能用“老虎还小”作为养虎的理由呢？要说服人们同意养虎，必须论证“老虎不会吃人”。人们担忧的是人工智能未来对人类的危害，要打消这个担忧，就必须论证“人工智能不会危害人类”，而不能将“人工智能还很初级”作为理由。

先不忙取笑这条荒谬的理由，因为许多人工智能的业界大佬和知名人物，都曾向公众说过这条理由。当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和伊隆·马斯克这样的智者领衔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时，一名业界知名人物就拿这条理由来反驳，还说这三人是“愚蠢的”。这就有点蛮横了。

如果我们无法论证“人工智能不会危害人类”，那就有必要重新考虑目前是否应该发展人工智能。

“人造的东西不可能超过人”是盲目信念

当然，人工智能通常都是智商比较高的人玩的。智力上的荣誉感，会使他们中的许多人羞于用“老虎还小”来说服人们同意养虎，他们知道应该论证“老虎不会吃人”，就是论证“人工智能不会危害人类”。而进行这样的论证时常用的理由之一，就是“人造的东西不可能超过人”。尽管这条理由其实也不能带来多少智力上的荣誉，因为很多非专业的公众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有谁给出过关于“人造的东西不可能超过人”这一论断令人信服的论证吗？从来没有。事实上，这一论断只是一个盲目的信念。这个信念实际上是在坚信：造物主一定比所造之物高明。这样的信念显然和宗教情怀有关。但是到了人工智能的争议中，那些理应最具无神论精神的科学主义者，却不假思索地从宗教信念中寻求思想资源。

而且，这个信念明显违背常识。一个简单的常识是，父母可不可以视为孩子的造物主？如果可以（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那孩子超过父母的情形，难道我们没见过吗？

“人工智能未必服从人类设定的道德标准”，没有足够的论证

比起前面两条理由来，“人类可以设定人工智能的道德标准”这条理由看起来相对比较专业，至少不会给玩人工智能的高智商人士直接带来羞愧感。这一条也是论证“人工智能不会危害人类”时常用的理由。

但是，有谁给出过关于“人工智能必然会服从人类设定的道德标准”这一论断令人信服的论证吗？同样从来没有。

更不幸的是，这一条也明显违背常识。一个明显的常识是：人类无法避免自己的一部分后代学坏。这样的例子日常生活中天天都在上演：父母从孩子记事起就灌输诚信、仁爱、友好、慷慨、勇敢等美德。这些难道不等于对人工智能的“记忆植入”和道德设定吗？可是，仍然有孩子无可救药地学坏了。在这一过程中，父母设定的道德标准、学校进行的规训矫正，都无法制止他。

学坏的孩子当然已经严重危害过一部分人类，比如这些坏人的刑事犯罪。但是，为何他们尚未统治全人类或危害人类整体呢？那是因为他们毕竟只是凡人，能力有限。然而，人工智能追求的是什么境界？不弄出“超人”来，个别科学家肯罢手吗？

“拔掉电源”未来未必可行

有的专业人士将人工智能分为四个级别：一是没有学习能力（智能程度也可以相当高）；二是具有固定的学习能力，而且习得的技能会趋于一个定值；三是具有固定的学习能力，技能增长没有极限，但因为它的学习能力是事先设定的，所以被认为不会成长为超级人工智能；四是具有无限的学习能力，可以成长为超级人工智能。

专业人士安慰说，此次与李世石对战的“阿尔法围棋”只是第2级的人工智能，第4级的人工智能还远远没有问世。其实，这里除了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老虎还小”之谬，还有更大的危险存在。

专业人士在试图打消公众对人工智能的忧虑时，经常提到一个说法：我们可以拔掉电源。这个说法，当对人工智能的想象停留在个体机器人阶段时，也许是成立的。更一般的说法可以是，只要人工智能还依赖有形的伺服机构才能实施行动，那我们也许还可以拔掉电源。但现实情形是，人工智能一旦与互联网结合，借用高度发达的定制、物流、快递等社会服务，几乎可以完全摆脱对所有伺服机构的依赖。这一点不仅在大量幻想作品中已经反复上演，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顺利实施了。当人工智能只是一个网上幽灵时，没有机体，没有形态，还谈什么拔掉电源呢？

以前阿西莫夫——提出“机器人三定律”的人——曾论证过个体机器人智能的物理极限，那有一定道理，但他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如今，我们必须特别关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结合，即使就个体机器人而言，这种结合也将快速突破智能的物理极限。就无形的人工智能而言，还有更大的危险性，一旦和互联网结合，上述1、2、3、4级人工智能之间的界限还能不能存在？如果居心叵测的人工智能研发者，有意突破这些界限，社会如何监控？人工智能进化成超级人工智能可能只需弹指一挥间，到时人类将措手不及，完全无法掌控。

“发展科学”也可能“唤出恶魔”

这是一个带有终极性质的问题。我们必须想清楚：究竟为什么需要人工智能？

工厂生产线需要更多工人吗？社会服务需要更多人手吗？需要人工智能为我们开车吗？需要人工智能为我们做手术吗？这些都是在想象人工智能应用前景时经常被提到的，但是都没有仔细推敲过。对于这些工作而言，人工智能真是必不可少的吗？

科学技术和资本结合之后的特征之一，就是为资本增值服务。科学家很少会坦白地说出来这一点。他们总是对公众说，是为了“发展科学”。仿佛“发展科学”就是终极目的，为了“发展科学”，一切别的事情，哪怕是人类的安危，都不必考虑了。

当然，还有另外的需求，如利用人工智能打赢战争，这就和利用核武器打赢战争一样。马斯克认为人工智能会“唤出恶魔”，比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还大；霍金则断言：“彻底开发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灭亡。”他们的话值得深思。田松教授有名言曰：“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真该三复斯言。

今天，我们即使不得不研发人工智能，也应该抱着和美国当年搞“曼哈顿工程”，或我们当年搞“两弹一星”类似的心态来进行。更理想的局面，则是各大国坐下来谈判，签署一个禁止或至少限制研发人工智能的国际协议，这才是人类之福。（2016年3月22日《解放日报》江晓原）